

以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史观构建中国 国际贸易学科自主知识体系

姚树洁

摘要：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制度型开放深化的背景下，中国国际贸易学科亟需以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史观为元理论，构建具有主体性、原创性与实践性自主知识体系。本文提出“四梁八柱”的理论分析框架，系统阐述历史逻辑统一与矛盾分析研究方法，给出课程体系与教材建设、学术共同体与成果转化、指标评估与示例议题实施方案，并探讨与西方传统贸易理论的对话与超越路径。研究认为，以实践为第一原则、以人民利益与国家安全相统一为价值基准、以制度型开放与安全效率相统一为实践抓手，是构建中国国际贸易学科自主知识体系的根本路径。

关键词：辩证唯物史观；国际贸易；自主知识体系；政治经济学；制度型开放；全球价值链

[中图分类号]F75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4670(2026)01-0021-12

引 言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经济实现了历史性跨越，完成了从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从农业社会向工业化城镇化社会、从相对封闭向制度型全面开放的根本转变，综合国力和国际贸易规模持续跃升(姚树洁, 2024)^[1]。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后，中国深度嵌入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和价值链，制造业规模、货物贸易和外汇储备长期位居世界前列，出口结构由劳动密集型向技术密集型和高附加值方向升级，“新三样”等产品国际竞争优势显著。这一实践进程既符合比较优势与国际分工的一般经济规律，更体现了中国道路的独特制度逻辑。

支撑中国改革开放和国际贸易持续发展的根本理论，并非对西方贸易理论的简单移植，而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创新(裴长洪, 2022)^[2]。党的百年奋斗历程表明，从毛泽东思想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再到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三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飞跃始终以辩证唯物史观为元理论遵循，在

[收稿日期] 2025-12-25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国快速城市化的经济社会生态影响研究”(25&ZD157)；中国工程院重大战略科技咨询项目“加快新型城镇化建设、推进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研究”(2025-XBZD-13)；教育部规划基金项目“中国科技创新极与城市经济均衡高质量绿色发展研究”(24YJA790081)

[作者信息] 姚树洁：辽宁大学李安民经济研究院资深教授，重庆大学国家级特聘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电子邮箱 yaoshujie@cqu.edu.cn

“生产力—生产关系—上层建筑”的动态统一中推进改革与开放(姚树洁, 2017)^[3]。对外开放和国际贸易并非抽象的政策选择,而是立足国情、服务人民福祉和国家发展的实践工具,其成效取决于制度条件、产业能力和治理体系的持续完善(Yao, 2003)^[4]。

进入新时代,我国国际贸易发展模式逐步从规模扩张向结构优化与制度型开放并举转型,安全、效率与发展三大目标的统筹协调性日益凸显。以新古典范式为核心的传统国际贸易理论,在解释中国制度演进、历史路径和权力结构方面显现不足,难以充分回应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现实问题。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史观以实践为第一原则、以矛盾分析为基本方法、以历史具体性为分析前提(恩格斯, 1995)^[5],为系统总结中国国际贸易经验、提炼可复制的理论范畴和分析框架,提供了根本的方法论基础。本文旨在以辩证唯物史观为元理论,回应制度型开放新阶段的现实需求,探索形成以中国经验为中心、兼具国际比较与实践检验功能的开放型国际贸易学科体系,为中国式现代化和高水平对外开放提供系统的理论支撑。

一、元理论与方法论基础

(一) 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史观的核心

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史观的根本要义,在于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辩证统一中把握社会经济发展的内在逻辑,并以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马克思, 1995)^[6]。新中国成立初期,面对生产力水平低下、资本与技术极度匮乏的现实条件,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首要任务是通过制度变革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实现“耕者有其田”,城市和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奠定了国有经济和现代产业体系的制度基础(Yao, 1994)^[7]。尽管这一阶段存在曲折,但其在教育、医疗、基础设施和工业体系方面形成的物质与制度积累,为改革开放后生产力的快速跃升提供了不可替代的前提条件。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不动摇的前提下,通过灵活调整生产关系,持续释放生产力潜能(Yao, 2006)^[8]。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率先破解农业主要矛盾,显著提升资源配置效率,奠定了工业化、城市化和外向型经济发展的物质基础。随后,城市改革以及对外开放逐步展开,形成了“吸引外资—促进出口—技术引进—生产力提升—改善民生”的发展闭环,其核心枢纽正是国际贸易(王珏, 2020)^[9]。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是这一实践逻辑的集中体现,它以长期改革积累为前提,通过更高水平的制度对接,显著提升了中国在全球贸易体系中的地位和发展能力(Yao, 2007)^[10]。由此可见,我国国际贸易的形成与演进,并非静态比较优势的自然结果,而是辩证处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在实践中不断调整制度安排的历史过程。

(二) 历史逻辑统一方法

辩证唯物史观强调历史逻辑统一。不同发展阶段、不同国际环境下,国际贸易的功能、形态与约束条件存在显著差异。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由于产业基础薄弱、外汇短缺和外部封锁,中国不具备参与国际分工的现实条件,贸易更多服务于生存型需求。改革开放初期,在制度、产业和观念尚不成熟的条件下,对外开放只能采取区域性、渐进式的推进范式,通过经济特区和沿海开放城市积累制度和治理经验。这些“实验场景”构成了我国国际贸易知识生成最重要的实践基础。加入

WTO后,我国国际贸易进入高速扩张阶段,深度嵌入全球价值链,成为推动经济跃升的关键力量。但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世界经济与地缘政治格局深刻调整,贸易保护主义和“泛安全化”趋势加剧,我国出口结构与西方发达经济体相比由互补型向竞争型转变,外部环境不确定性显著增强。这一变化表明,国际贸易已不再是单纯的经济问题,而是与科技竞争、产业安全和国际权力结构高度交织。因此,构建具有主体性的自主知识体系,必须将我国国际贸易置于世界历史进程中加以理解,动态分析全球价值链重构、地缘政治演变和技术变革对贸易结构、竞争格局与政策空间的影响,为国家应对外部冲击和参与制度博弈提供理论支撑。

(三) 矛盾分析方法

运用矛盾分析方法,有助于识别不同阶段国际贸易的主要矛盾及其主次方面,避免陷入单一效率或单一安全的片面化理解(马克思和恩格斯,1995)^[11],这是国际贸易理论中国化的重要方法论基础。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飞跃。习近平在党的十九大工作报告中指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成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在国际贸易领域,我国已从单纯追求规模与速度导向,转向注重贸易发展对区域协调发展、高质量发展、收入分配优化及关键核心技术突破的支撑作用(姚树洁等,2025)^[12],为国民经济长期稳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基础。同时,通过高水平对外开放,我国积极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形成战略博弈优势,实现以开放促合作、以合作谋共赢的国际经贸新态势。

二、构建中国国际贸易学科自主知识体系的理论框架

构建我国国际贸易学科自主知识体系,关键在于形成价值立场明确、结构层次清晰、逻辑自洽且具有现实解释力与实践指向性的整体性理论框架。基于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史观,该体系不以单一模型或技术路径为中心,而是通过分层结构化设计,将价值判断、理论范畴、制度实践与研究方法有机统一,形成能够系统解释中国经验、回应时代命题并参与国际对话的学科体系。

本文提出以“四梁八柱”为核心的理论框架(见图1)。“四梁”构成学科体系的基本结构层级,“八柱”则作为贯穿不同层级的分析支点,二者相互嵌合,共同支撑中国国际贸易学科自主知识体系的整体建构。

(一) “四梁”: 中国国际贸易学科自主知识体系的基本结构层级

1. 元理论层

元理论层是学科体系的价值根基与方法论源头,回答“如何认识国际贸易及其发展规律”的根本问题。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史观以实践性、历史性和矛盾性为基本特征(恩格斯,2009)^[13],突破了新古典贸易理论将技术视为外生给定、将制度预设为无摩擦外生、将均衡视为静态终点的理论局限。在这一层面,国际贸易被理解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互动的历史结果,是国家利益、资本逻辑与制度安排博弈的现实过程,并随世界历史进程和国际政治经济格局演变而动态变化。元理论层确立了以实践为第一原则、以人民利益与国家安全相统一为价值基准的学科方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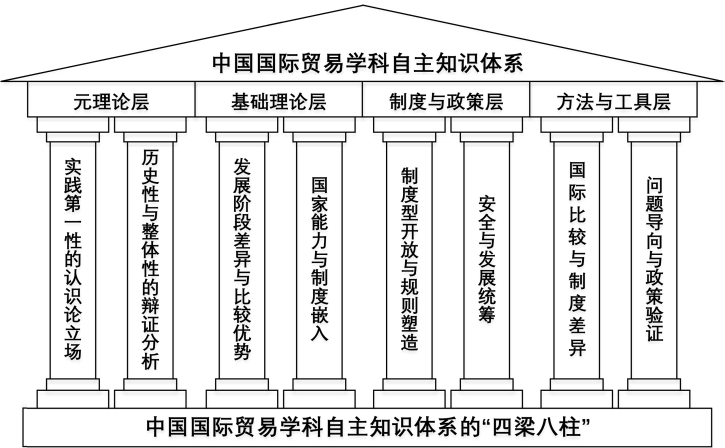


图 1 理论框架的“四梁八柱”结构示意图

注：作者感谢辽宁大学博士研究生陈曦对研究的支持。

2. 基础理论层

基础理论层承担对国际贸易基本规律的系统解释功能，是连接元理论与经验分析的关键中介。该层并非简单否定比较优势、新贸易理论或新新贸易理论，而是在批判吸收其分析工具的基础上，引入历史维度、制度变量与国家能力因素，对其进行结构性重构，逐步形成以发展阶段差异、产业结构演进和技术能力积累为核心变量的分析框架，实现研究范式由“市场—价格—均衡”向“制度—结构—能力”的转变。

3. 制度与政策层

制度与政策层是理论体系与现实运行之间的枢纽，重点分析外贸制度安排、开放模式与政策工具的形成逻辑及其治理绩效。该层强调国际贸易深度嵌入国家治理体系与全球制度结构，是国家发展战略和现代化进程的重要组成部分，体现我国由规则接受者向规则参与者、塑造者转变的历史进程，使理论分析具备鲜明的实践内涵与政策指向。

4. 方法与工具层

方法与工具层为理论体系提供可操作的研究路径，其核心原则是“方法服从问题”。通过综合运用历史分析、国际比较、制度分析、计量研究与案例研究，形成问题导向、实践导向与政策验证相结合的方法体系，避免形式化建模对现实解释力的挤出。

(二)“八柱”：支撑中国国际贸易学科自主知识体系的分析支点

1. 实践第一性的认识论立场

实践第一性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根本立场(列宁，1995)^[14]，也是我国国际贸易学科区别于西方主流范式的首要特征。国际贸易并非在抽象假设下自动运行的均衡体系，而是国家、企业与劳动者在特定制度条件和国际环境中展开的现实经济实践。我国国际贸易理论的生成逻辑，必须坚持从改革开放、加入 WTO、全球价值链嵌入、制度型开放等具体实践中提炼一般性认识，再反过来指导新的实践。

2. 历史性与整体性的辩证分析

辩证唯物史观强调社会经济现象的历史性和整体性(马克思，1995)^[15]。国际

贸易的发展并非线性过程,而是嵌入特定历史阶段、国际格局和国内发展条件之中。我国国际贸易研究必须将其置于社会主义革命、改革开放和新时代三个阶段的连续演进中加以理解,同时将贸易问题与产业结构、技术进步、金融体系、区域发展、收入分配和国家安全等因素进行整体分析,而非割裂为单一部门或技术问题,从而提升对长期结构性矛盾的解释能力。

3. 发展阶段差异与比较优势

与传统贸易理论将比较优势视为既定不同,我国实践表明,比较优势具有鲜明的阶段性和动态可塑性。发展阶段差异决定了一国在不同历史时期的产业分工位置、贸易结构和政策选择边界。我国国际贸易学科强调将产业升级、技术能力积累和制度变迁纳入统一分析框架,揭示比较优势由“自然禀赋型”向“技术—制度复合型”演化的内在机制,为解释我国出口结构升级和后发国家赶超路径提供理论依据。

4. 国家能力与制度嵌入

国家能力是我国国际贸易持续发展的关键变量。不同于新古典框架中将国家视为外生的做法,我国国际贸易学科自主知识体系需将国家理解为制度供给者、战略协调者和风险治理主体。贸易绩效不仅取决于市场效率,还取决于国家在基础设施建设、产业政策协同、贸易规则谈判、公共服务供给和风险防控方面的综合能力。这一支点为理解我国贸易政策的稳定性、连续性与执行力,以及制度优势向贸易竞争力的转化机制,提供重要解释。

5. 制度型开放与规则塑造

制度型开放是新时代我国对外开放的重要特征,也是国际贸易理论中国化的核心创新之一。与传统以关税减让和要素流动为中心的开放模式不同,制度型开放强调规则、规制、标准和治理体系的系统对接与自主创新。在这一支点中,国际贸易被理解为制度协调与规则竞争的过程。通过自贸试验区、自由贸易港和高标准经贸协定,我国正由规则被动接受者向规则参与者和塑造者转变,为构建具有国际影响力的贸易理论提供现实基础。

6. 安全与发展统筹

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背景下,国际贸易的不确定性和系统性风险显著上升,单纯以效率最大化为目标的分析框架已难以适应现实需求。我国国际贸易学科必须将安全因素内生化,系统分析供应链安全、关键技术自主可控、贸易依赖度和风险分散机制等问题,在开放条件下统筹效率与安全。这一支点为理解我国在坚持高水平开放的同时强化安全底线的政策取向,提供了理论支撑。

7. 国际比较与制度差异

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强调全球资本主义体系中的不平等结构与权力关系(马克思,2003)^[16]。我国国际贸易学科中的国际比较,并非简单的指标排序,而是将不同国家的发展模式、制度安排和历史路径置于世界历史结构中加以分析,揭示全球贸易规则中的制度不对称和发展不平衡问题,从而为我国参与全球经贸治理和制度博弈提供理论依据。

8. 问题导向与政策验证

自主知识体系的生命力在于解决现实问题的能力。问题导向不是阶段性研究策

略，而是贯穿理论建构全过程的方法论原则。我国国际贸易学科强调以现实问题为起点，通过政策评估、案例分析和经验检验，对贸易制度和政策效果进行系统分析，并将研究结论反哺理论创新，形成理论与实践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避免学科发展陷入自我封闭。

三、构建中国国际贸易学科自主知识体系的研究方法

构建我国国际贸易学科自主知识体系，必须在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史观指导下，形成能够解释中国实践、回应时代问题并具有一般理论意义的方法体系。这一方法体系以历史逻辑统一与矛盾分析为核心，突破以静态均衡分析和技术中性假设为特征的西方主流范式，在历史演进与现实实践的辩证统一中展开理论建构。

(一) 历史逻辑统一

历史研究在我国国际贸易学科中并非对制度变迁的线性描述，而是通过历史过程揭示制度选择背后的内在逻辑及其发展方向。依据辩证唯物史观，国际贸易制度演进并非外生规则的简单移植，而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围绕生产力发展水平、生产关系调整与国家战略目标互动产生的结果。我国国际贸易的发展路径，体现了制度选择与国家发展阶段之间的内在一致性。

从历史逻辑统一的视角看，我国国际贸易制度演进呈现出由低到高、由被动到主动的清晰主线，可概括为“生存型外贸—效率型外贸—发展型外贸—结构型外贸—安全与发展统筹型外贸”的演进过程(见图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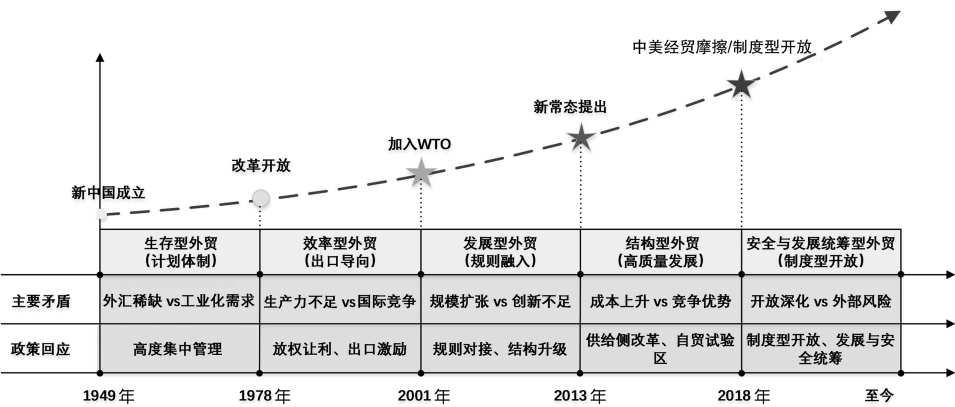


图 2 中国国际贸易制度变迁的历史逻辑主线

新中国成立初期，外贸高度服务于工业化起步和资源保障，制度安排以集中化为特征；改革开放后，外贸制度转向市场化和效率导向，成为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加入 WTO 后，制度重心转向规则对接与结构优化；进入新常态后，外贸更加注重质量提升和内生能力培育；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背景下，国际贸易制度进一步向统筹开放与安全、效率与韧性的方向演进。这一历史逻辑表明，我国国际贸易制度始终围绕国家发展目标动态调整，其功能定位随着发展阶段不断升级，构成我国国际贸易理论生成的现实基础。

(二) 矛盾分析

矛盾分析是辩证唯物史观的核心方法,也是构建中国国际贸易学科自主知识体系的重要研究路径。国际贸易并非均衡状态下的静态配置结果,而是在多重矛盾运动中不断演进的历史过程。理论研究应立足不同时期国际贸易领域的主要矛盾及其转化机制,揭示制度变迁和政策选择的内在动力。

从纵向演进看,我国国际贸易发展的主要矛盾经历了由“生存保障与效率提升”,到“结构升级与质量提升”,再到“制度型开放与安全可控”的阶段性转化,反映了国际贸易发展从解决“有没有”到追求“好不好”,再到统筹“安全”的历史进程。

从横向结构看,国际贸易领域长期并存“规模扩张与结构优化”“外部依赖与内生能力”“开放深化与风险暴露”等多重矛盾。这些矛盾在不同阶段呈现出不同主次关系,决定了贸易政策与制度选择的重点方向。当前阶段,制度型开放不断深化与外部不确定性、规则博弈和系统性风险上升之间的张力,已成为国际贸易领域的主要矛盾。

四、构建中国国际贸易学科自主知识体系的实施方案

构建我国国际贸易学科自主知识体系,必须以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史观为指导,将价值立场、理论原则与学科建设实践有机结合,通过系统化实施方案推动理论创新向制度化、规范化和可持续方向发展。围绕课程体系与教材建设、学术共同体与成果转化、指标评估与示例议题,本文提出如下实施路径。

(一) 课程体系与教材建设

课程体系与教材建设是学科自主知识体系的重要载体,需立足中国式现代化实践,重构具有中国特色的话语体系与知识结构。课程体系设计应构建“基础理论—中国实践—前沿交叉”三层递进结构:基础理论层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根基,阐释国际分工、世界市场与价值转移的内在机理,批判地吸收西方贸易理论的有益成分;中国实践层聚焦我国对外贸易制度演进,总结全球治理参与、“一带一路”建设与高质量开放的实践经验,提炼主体性理论命题;前沿交叉层围绕数字贸易、绿色贸易等新议题,运用辩证唯物史观回应现实挑战,推动理论与实践的双向互促。教材建设则需系统规划原创性教材体系,杜绝对西方教材的简单修订补充,重点编写《马克思主义国际贸易理论》《中国对外开放史》等教材,将自由贸易试验区、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等重大实践转化为学理资源,同时建立动态更新机制,及时纳入《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DEPA)、海南自由贸易港等新进展,保障教材的时代性与现实相关性。

(二) 学术共同体与成果转化

学术共同体是知识生产的主体,成果转化是知识价值实现的关键环节,需通过协同机制推动理论与国家实践深度融合。在学术共同体建设上,应构建“高校—科研机构—政府部门—企业”协同平台。高校与科研机构聚焦基础理论与前沿问题研究,政府部门提供政策需求与制度背景,企业围绕外贸新业态参与联合研究,推动成果转化。同时依托专项课题、定期研讨与青年人才培养,形成稳定的理论创新力量。在成果转化方面,需搭建“理论成果—政策建议—产业应用”的多层次转化链条。通过学术著作与高水平论文夯实理论话语权,以决策咨询报告服务国

家战略，借助智库平台、企业合作和政策宣讲推动应用落地。同时，将政策贡献与社会影响纳入评价体系，实现学术评价从“唯论文”向“重贡献”转变，并通过国际合作提升中国理论的国际传播力。

(三) 指标评估与示例议题

科学评估与示例研究是检验自主知识体系有效性的关键工具。在指标评估方面，应突破以规模和增速为核心的传统评价范式，构建兼顾质量、结构与治理能力的新型指标体系。基于“结构与质量—安全与韧性—开放与规则—包容与福利”四个维度，形成多层次评价框架(见图 3)，系统衡量国际贸易高质量发展成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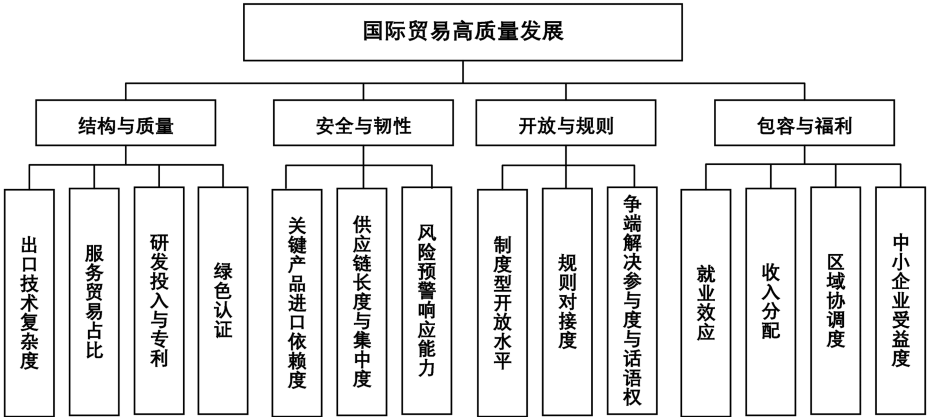


图 3 国际贸易高质量发展的四维框架与核心指标

在示例议题设计上，围绕全球价值链重构、制度型开放、数字要素跨境流动和绿色贸易等前沿方向，形成一批具有理论创新价值和实证可行性的研究议题。相关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如表 1 所示，通过多方法交叉验证，提升研究结论的解释力与政策适用性。

表 1 示例研究议题的方法与数据来源

研究议题	主要方法	数据来源
中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升级的路径与制度条件	全球价值链网络分析、投入产出分析、企业面板计量模型	世界投入产出数据库(WIOD)、OECD TiVA 数据库、中国海关数据库、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行业年鉴
制度型开放对生产率与创新的影响：基于自由贸易试验区的准自然实验	双重差分法(DID)、事件研究法、工具变量法	自由贸易试验区政策文本、中国海关数据库、上市公司年报、国家知识产权数据库
数字要素跨境流动的制度供给与治理框架	政策文本分析、制度比较、案例研究	数据要素相关法规、跨境数据流动政策、平台企业公开信息、国际组织数据库(OECD、UNCTAD)
绿色贸易规则对产业结构与碳减排的双重影响	结构分解分析(SDA)、环境投入产出模型、复杂网络分析	欧盟和国际绿色贸易法规文本、中国双碳统计数据、投入产出表、行业碳排放数据库
“一带一路”的贸易效应与互联互通的长期收益	空间计量模型、引力模型、长期事件研究法(LER)	世界银行发展指标数据库(WDI)、联合国商品贸易统计数据库(UN Comtrade)、“一带一路”国家基础设施数据、港口与物流数据、政策文本

五、与主流贸易理论的对话与超越

构建中国国际贸易学科自主知识体系,并非对西方主流贸易理论的简单否定,而是在开放对话、批判吸收与理论重构中实现“吸收—补充—超越”的系统演进(见表2)。其目标不是形成封闭的本土理论体系,而是在坚持中国立场与实践基础的前提下,推动国际贸易理论由以效率为核心的单维分析范式,向融合制度建构、发展导向与治理效能的复合逻辑范式转变。

(一) 吸收

我国国际贸易学科自主知识体系充分吸收主流贸易理论在解释贸易形成机制和资源配置效率方面的核心洞见。新古典贸易理论以要素禀赋差异为分析起点,系统揭示国际分工、贸易结构与福利增进之间的基本逻辑,为分析贸易成本、政策福利效应和产业比较优势提供了重要工具。新贸易理论通过引入规模经济、不完全竞争和产品差异化,拓展了对产业内贸易和市场结构的解释能力。新新贸易理论进一步将分析单元下沉至企业层面,揭示企业异质性、生产率差异与贸易参与(包括出口模式选择)之间的内在联系,为基于微观数据的实证研究奠定基础。总体而言,西方贸易理论在模型构建、计量方法和经验识别方面形成了成熟工具体系,是我国国际贸易研究不可或缺的知识基础,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可以在充分吸收、规范运用这些工具的基础上展开。

(二) 补充

在吸收西方理论分析工具的同时,我国国际贸易学科自主知识体系需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引领下,从制度、历史和治理维度对其进行系统性补充,以弥补其在解释现实世界复杂贸易现象时的结构性不足。西方贸易理论多将制度视为中性或外生变量,难以解释发展阶段相近、要素禀赋相似国家之间的差异化贸易路径。我国实践表明,制度型开放安排、国家能力建设和政策协调机制在塑造贸易结构、推动产业升级和应对外部冲击中发挥着关键作用。此外,西方理论普遍弱化历史路径依赖和发展阶段差异,倾向以静态均衡解释长期发展问题,而我国作为后发大国在开放条件下实现产业跃迁的经验,凸显了发展战略、政策选择与历史阶段对贸易模式演进的深刻影响。在全球供应链、价值链、技术链研究中,通过引入国家治理、产业贸易政策演变、国内外贸易规则和国际贸易制度话语权等维度,我国国际贸易研究将能够更加充分揭示全球分工中的权力结构和价值分配问题,从而拓展了传统效率导向分析的解释边界。

(三) 超越

在吸收和补充的基础上,我国国际贸易学科自主知识体系要敢于对西方主流贸易理论实现建构性超越。以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史观为方法论根基,中国国际贸易自主知识体系可以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出发,将国际贸易理解为嵌入国家发展战略和社会结构演进的历史过程。

不同于以效率最大化为单一目标的分析范式,中国自主贸易理论强调在国家利益、人民福祉与全球责任之间实现动态平衡,将贸易发展置于中国式现代化和高质

量发展的整体框架中加以考察，突破传统理论中开放与自主、安全与效率的二元对立，揭示通过制度创新和战略协同实现动态统筹的现实路径。在分析范式上，自主知识体系由结果解释转向过程解释，由静态均衡转向动态演进，由单一主体分析转向多主体协同治理分析，形成更具现实解释力和政策适用性的理论框架。这种“超越”并非否定西方理论，而是在全球化深度调整的背景下，立足中国长期开放实践与后发赶超经验，形成面向发展型大国、兼顾安全与发展的贸易理论新范式，为国际贸易理论体系的多元化重构提供中国方案。

表 2 与西方主流贸易理论的对话与超越对照表

维度	新古典贸易理论	新贸易理论	新新贸易理论	辩证唯物史观 (中国自主知识体系)
理论 内核	基本假设：完全竞争市场、企业同质、同质产品、外生技术差异、两种要素。 贸易动因：生产要素禀赋差异—外生比较优势。	基本假设：不完全竞争市场(垄断竞争)、企业同质、差异化产品、内生技术差异、多种要素。 贸易动因：规模经济效应—内生比较优势。	基本假设：不完全竞争市场、企业异质、差异化产品、内生和外生技术差异、多种要素。 贸易动因：企业的异质性—外生和内生的比较优势。	以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史观为方法论根基，将国际贸易视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在全球范围的延伸，强调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通过调整生产关系(制度、政策)来适应、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从而塑造新的国际竞争比较优势。
分析 单位	国家/产业层面(行业间分工)	产业层面 (行业内分工)	企业层面 (企业间分工)	国家—制度—产业—企业 (多层次分析)
制度与 历史	制度通常被视为中性或外生变量，历史背景和发展阶段差异被弱化。	部分考虑政策环境，但制度多作为参数存在,缺乏系统演进分析。	制度影响通过企业成本和进入壁垒间接体现，仍以外生设定为主。	强调制度内生性与历史路径依赖，将制度型开放、发展阶段与政策选择视为贸易结构演进的关键变量。
权力与 治理	市场至上，推崇自由贸易，淡化国际权力结构和不平等。	承认市场力量，但对国际规则与治理结构分析不足。	聚焦企业权力，分析高生产率跨国公司的全球权力配置和内部治理。	国家主导下的多元共治：立足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在国内推动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相结合，统筹开放与安全；在国际上倡导互利共赢，反对霸权与单边主义，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变革不公正的全球治理体系。
政策 含义	自由贸易：主张消除壁垒，发挥要素禀赋优势。	战略性干预：政府可干预以帮助本国企业在规模经济产业获取优势。	选择性扶持：政策应支持高生产率企业进入全球市场。	动态适配的政策体系：主张高水平制度型开放与发展—安全统筹，依托制度供给、产业升级与治理能力建设推进高质量开放，着力强化国际贸易的安全性、自主性与多元化发展韧劲，助力内循环健康发展。

六、结论与建议

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与制度型开放不断深化的背景下,以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史观为元理论构建中国国际贸易学科自主知识体系,具有鲜明的时代必然性与现实紧迫性。研究表明,立足实践第一原则,以人民利益与国家安全相统一为价值基准,以制度型开放与安全效率统筹为实践抓手,我国国际贸易学科能够在元理论、基础理论、制度政策与方法工具等层面形成具有主体性、原创性和现实解释力的系统性知识体系,并为全球贸易理论提供可比较、可检验的中国经验。基于上述结论,本文提出以下建议。

一是坚持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史观的根本指导,明确学科自主构建方向。应以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为分析主线,系统阐释我国国际贸易发展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与实践逻辑;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关于高水平对外开放、全球治理以及人民利益与国家安全相统一的重要论述作为理论创新的根本遵循。在此基础上,批判性地借鉴西方贸易理论中反映市场经济一般规律的有益成分,避免简单套用,以中国实践检验、发展和超越既有理论。

二是深植中国实践沃土,夯实理论创新的现实根基。围绕我国由贸易大国迈向贸易强国的进程,聚焦制度型开放、产业链供应链韧性、数字贸易、“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等关键议题,加强对自由贸易试验区、海南自由贸易港、跨境电子商务、“新三样”出口等实践的系统研究,推动实践经验的学理化提炼,形成具有标识性的核心概念、分析框架和理论命题,实现从“中国实践”向“中国理论”的转化。

三是深化“两个结合”,夯实学科建设的思想与文化根基。一方面,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吸收“义利兼顾”“和合共生”等思想资源,推动其在国际经贸规则和全球治理理念中的创造性转化;另一方面,与我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围绕超大规模市场、共同富裕目标和绿色转型要求,系统研究其对国际贸易战略与政策选择的塑造机制。

四是强化学科交叉与协同创新,建设有组织的学术共同体。推动国际贸易学与政治经济学、国际关系、法学以及数字技术等领域的深度融合,整合高校、科研机构与政策研究部门资源,通过协同攻关提升理论创新的系统性与解释力。

五是提升国际学术话语能力,深化文明互鉴。以通行学术语言系统阐释中国制度型开放和贸易治理经验,推动理论成果、教材与课程体系走向国际学界,积极参与并引领全球贸易理论与规则的重构,为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贡献中国方案。

[参考文献]

- [1] 姚树洁. 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外部环境和方向路径[J]. 人民论坛·学术前沿, 2024(23): 48-56.
- [2] 裴长洪. 中国开放型经济学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逻辑[J]. 经济研究, 2022, 57(1): 37-55.
- [3] 姚树洁. 用马克思主义实践论指导中国经济建设与理论研究[J]. 经济研究, 2017, 52(5): 21-23.

- [4] YAO S, ZHANG Z. Openness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 a Comparative Study of China and the Asian NIEs [J]. Journal of Chinese Economic and Business Studies, 2003, 1 (1): 71-95.
- [5] 恩格斯. 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 [M]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4卷.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5.
- [6] 马克思. 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 [M]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1卷.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5.
- [7] YAO, S. Agricultural Reform and Grain Production in China [M]. London: Macmillan Press, 1994.
- [8] YAO S. On Economic Growth, FDI and Exports in China [J]. Applied Economics, 2006, 38 (3): 339-351.
- [9] 王珏. 中国对外贸易 70 年变迁 [J]. 西安财经大学学报, 2020, 33 (1): 13-22.
- [10] YAO S, WEI K. Economic Growth in the Present of FDI from a Newly Industrializing Economy's Perspective [J]. 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 2007, 35 (1): 211-234.
- [11] 马克思, 恩格斯. 共产党宣言 [M]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1卷.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5.
- [12] 姚树洁, 左舒雅, 殷红. 数据规制与企业技术创新——理论及来自全球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J]. 国际贸易问题, 2025 (7): 1-19.
- [13] 恩格斯. 反杜林论 [M]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9卷.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 [14] 列宁. 唯物和经验批判主义 [M] //列宁选集: 第2卷.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5.
- [15] 马克思. 自然辩证法 [M]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4卷.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5.
- [16] 马克思. 资本论 (第2卷) [M]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45卷.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3.

Construction of an Autonomous Knowledge System for China's International Trade Discipline Based on Marxist Dialectical Historical Materialism

YAO Shujie

Abstract: Against the backdrop of the unprecedented great changes unseen in a century and the deepening of institutional opening-up, China's international trade discipline urgently needs to adopt Marxist dialectical historical materialism as its meta-theory to construct an autonomous knowledge system with distinct subjectivity, originality and practicality. This paper proposes a theoretical analytical framework of the "Four Beams and Eight Pillars", systematically expounds the research methods of the unity of historical logic and contradictory analysis, and provides the implementation schemes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curriculum system and textbooks, the development of the academic community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research achievements, as well as the indicator evaluation and sample research topics. Furthermore, it explores the paths for dialogue with and transcendence over traditional Western trade theories. The study concludes that taking practice as the primary principle, adhering to the unity of people's interests and national security as the core value criterion, and grasping the unity of institutional opening-up, security and efficiency as the practical starting point constitute the fundamental path for constructing the autonomous knowledge system of China's international trade discipline.

Keywords: Dialectical Historical Materialism; International Trade; Autonomous Knowledge System; Political Economy; Institutional Opening-up; Global Value Chain

(责任编辑 武 齐)